

sinology

JOHN KING FAIRBANK JOHN KING FAIRBANK

费正清集

陶文钊编选 林海 符致兴等译



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名家
学术丛书·中国研究系列
SINOLOGY SERIES

693948

费正清集

南文利编述 林海 符致兴等译

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名家
学术丛书·中国研究系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费 正 清 集

陶文钊 编选

林海 符致兴 等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 130 号)

天津市宝坻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4 插页 300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01-00936-2/C·89

定 价: 12.50 元

出版献辞

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这点显得尤为必要。做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现代世界社会科学此起彼伏的学术思潮、层出不穷的学术成果，我们应具备在对话的基础上拿来参考、为我所用的气魄与实力。在保持敏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辨别力的同时，“占有，挑选”（鲁迅语），恰到好处地借鉴，入木三分地批评。而这一切的前提，首先在于对现代世界社会科学成果充分、准确的了解和评价。

现代世界学术著作浩如烟海，即使在某一领域内也是汗牛充栋，要想充分、准确地了解谈何容易，更遑论把握、评价了。将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各领域名家大师的毕生学术成果进行筛选，择其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或著述节选，结成选集出版，从而为读者充分、准确地了解现代世界主要学术成果提供一个事半功倍的途径，为对其进行总体把握和扬弃提供一个资料上的起点，这就是编辑、出版这套“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名家学术”丛书的缘起。至于国外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种种局限存在的谬误与不当之处，相信广大读者自会辨别、取舍，无庸多言。

本丛书所称之“社会科学”系依国内用法，既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西方所称的“社会科学”，也包括哲学、文艺理论等西方所称的“人文科学”某些学科。

本丛书采取个人选集的形式，不出多人合集。所选收的作者应为本世纪以来各领域内公认的名家，或各领域中主要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其研究课题与我国关系较大，较有参考价值的著名学者。

本丛书拟根据不同学科（如哲学、经济学、史学等）或专题（如中国研究、现代化研究等）分为若干系列，陆续推出。每系列拟出书几本至十几本不等，每本约30万字左右。

以个人选集的形式系统介绍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学术成果，是一项大工程，目前国内尚不多见。这对我们是一种摸索，限于经验和水平，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帮助与指正，以在中国走向世界、积累和塑造文化的过程中尽我们的菲薄之力。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5月

前 言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费正清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费正清于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达科他州休伦，祖父是公理会牧师，父亲是律师。费正清曾求学于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1925—1927年）和哈佛大学（1927—1929年）。1928年，从英国来哈佛执教的查尔斯·韦勃斯特建议他研究近代中国，因为故宫收藏的清季档案已经可供使用。1929年秋，费正清从哈佛本科毕业后，在罗兹奖学金资助下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在伦敦结识了曾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在马士影响下，费正清决定着手研究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建立问题。他于1932年初来华，一边进修汉语，一边在清华大学蒋廷黻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是年夏，罗兹奖学金用毕，费正清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均遭拒绝。他接受亲属资助继续在华的研究工作，并与相识数年的女友结婚。夫人费慰梅也是中国学家，研究中国的艺术、考古和建筑。是年夏，费正清接受蒋廷黻建议，在清华教授经济史，并在海关学院教海关史。费正清于1935年11月离北平，1936年1月抵牛津，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论文经修

改、补充后，于1953年出版，题名《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

费正清获博士学位后，即返回哈佛任教。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战略情报局前身）研究分析处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担任战略情报局官员兼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第三次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直至1946年7月。

费正清于1946年8月回到哈佛，成为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进入50年代，他主持两个研究班培养中国学和东亚学的学生：区域研究（东亚）两年制的硕士班和历史博士班。1955年他取得校方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他从教职退休时该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于1959年任亚洲研究协会会长，1968年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1972年5、6月间，费正清应邀访华六个星期，1979年4月再次来华访问，8月又陪同副总统蒙戴尔访华。1991年9月14日，费正清因心脏病发作在坎布里奇的奥本山庄医院去世，享年84岁。

费正清的著作，有的已经译成中文。但他从事中国研究半个多世纪，著述甚丰，已经翻译介绍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鉴于他在美国中国学界的公认地位，他的著作对美国几代中国学家的影响，编译者认为，更多地介绍他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了解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有分析、有扬弃地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有用处的。编译这本文集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多地向国内学术界

提供学术信息。

阅读本书和费正清的其他著作，读者不难发现，作者的有些看法与我国学术界的观点比较接近，有些看法则与中国史家的共识相去甚远。作者关于中美关系的有些看法是颇有见地的。他在二次大战期间即已感到，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人心，“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朝一日终将发生”，因此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年代，他公开表示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认为“如果我们盲目反对革命，我们终将发现自己被群众运动赶出亚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主张美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采取现实态度，对新政权予以事实上承认，发展同新政权的商业、文化往来，放弃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民族自决的例子，而不是外来的侵略。唯其如此，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他也难免受到攻击，但他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在1966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费正清主张，美国应当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应当使与中国的争论降级，应当默许其他国家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通过迂回的道路改善对华关系，发展与中国的贸易、技术、新闻、人员往来，应当让中国参与众多的国际活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他敦促美国政府遵循上海公报的精神尽快解决同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权打交道的问题，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¹⁾ 费正清为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努力。

但作者的有些看法则是中国学者难以同意的，比如中国学者比较熟悉的作者用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他认为，19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基本是皇朝的循环，中国社会是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西方国家来到中国，对停滞不前的社会产生了冲击，中国对此做出了反应，才逐渐改

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传统习惯，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后来，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认为西方是进取的、中国是被动的这种传统观点必须放弃。⁽²⁾再如，作者既认为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是近代史上延续最久的国际性犯罪活动，为早期英国侵华输了血，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却又说，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英国政府要求缔约只有一般性的目的，即废除朝贡制度结构，建立中外交往的制度，等等。⁽³⁾这样，鸦片战争的性质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而且这样一些互不一致的说法像是作者自己在反驳自己。在这里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背景。无庸讳言，清政府当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很局限，一些观念也是落后的、陈腐的。但是，在19世纪前半期的国际关系中，“外交平等”、“对等贸易”这样一些原则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意义呢？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那些国家不择手段，包括用血与火的方法，侵吞殖民地，掠取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原则是毫不相干的。资本主义国家间虽然标榜这些原则，却也不时为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大动干戈。总之，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那个时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一幅弱肉强食的图景，而不是以“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为基础的相亲相爱的国际大家庭的景象。鸦片战争以后所订的条约也清楚说明了问题：这些条约对列强意味着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对中国则是丧权辱国和不断加深的苦难，这与“平等”、“对等”真有天壤之别。

再如，作者既认为不平等条约制度是靠武力建立起来的，也只有用炮舰外交才能维持，中国的主权在条约中不断受到损害，条约口岸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又认为，条约最后作出的安

排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汉夷共治”的传统（元代和清代），条约制度的实行以中西共治取代了满汉共治，海关和租界便是中西共治的典型。^{〔4〕}这就把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其间会产生各种复杂的情形，包括由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执掌政权这样的情况，这正是这个多民族国家丰富多采的历史中的重要篇章。它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风马牛不相及。中国海关在很长时期中沦为英国势力控制下的一个“国际性”机构，这正是外人侵夺中国主权的一个重要事实。由于这种控制一方面反映了某个大国在华利益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该国进一步扩张势力，因此列强在争夺其他利权的同时，也争夺对海关的控制权。至于租界，更是中国深陷入半殖民地的重要象征之一，它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系统，形同“国中之国”，成为列强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据点。这些半殖民地中国的毒瘤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与中国的传统毫不相干。作者把仿佛相似的某些表象加以比附，结果是模糊了事情的实质。

自然，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和讨论费正清的看法。外国中国学家由于与中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价值观念不同，在对历史的认识上，在某些方面得出与中国学者不同的结论，这种情况大概是相当普遍的，中国读者见得多了。编译者相信，读者自会对本书选入的各篇所表述的观点加以鉴别，得出正确的看法。

编选本书的原则是：一、已有中文译本或即出中译本的著述不再收入；二、教科书，如三卷本的东亚文明史和《中国：传统与变革》不选入；三、不以编选者本人赞同与否做为取舍

的标准，而力求把作者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的论述中较有代表性者包容进来。作者在晚年撰写了许多书评，为了反映他晚年的学术活动，收入了几篇书评；四、对入选各篇不加删节。文中有些偏颇、不当的提法，个别地方尚与史实有所出入，如把汉族居住处称做“中国本部（本土）”，在讲到朝贡制度时，把西藏等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同当时做为中国藩属的朝鲜、越南相提并论，以及把当前中国牵强地与历史比附的一些说法，凡此等等，显然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为了反映作品的全貌，使读者对费正清及其学术思想有一个全面、真实的了解，仍照原文译出，请读者注意鉴别。由于编译者所见有限，功力不逮，编译工作的粗疏欠缺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指出。费正清教授对本书的编译工作提供了不少帮助，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

本书由林海、符致兴、曾学白、杜继东、王建朗、高士华、吴必康、陶文钊等同志合作译校，每篇末尾均注明了译校者，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为便于阅读，编选者在每篇之前加了简短的题解。张振 同志为本书的编选提供了宝贵意见，卿斯美同志在美国帮助复印资料，陶志辉同志帮助整理附录，在此一并致谢。

陶文钊

1991年5月20日

注释：

(1) 本书第二编，并见《与中国的五十年不解之缘》，第244—245，282—284页。

(2)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第一章：《东亚：近代的变革》，第

3--9、80--82、404--407 等页；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多处，中华书局，1987 年版；《剑桥中国史》，第 13 卷第一章；本书第十六篇。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5 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年版；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80--87 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6 年版。

（4）本书第四篇。

序

（为《费正清集》而作）

我应邀为本书作序，对此深感荣幸。如果读者对本书感到兴趣的话，那么就应当知道与它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本书固然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但它是为了让美国人理解而写的，其中有许多内容与美国对华政策有关。作者试图与之沟通的读者，除去要跨越时间上的鸿沟（所有历史著作都是如此），还要跨越文化上的鸿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

拿跨越时间鸿沟来说，作者就得告诉 20 世纪的读者有关 19 世纪五十年代从广州、上海或福州至伦敦或纽约进行茶叶贸易，以及从印度到中国沿海进行鸦片贸易的飞剪船的情况。在各种情况下，装有宽大风帆的狭长的飞剪船都要尽快赶在竞争者之前将货物运到市场，使货物卖到最高价钱。这是世界贸易扩张中属于技术的一部分。对于一个来自人口稀少、平原辽阔的南达科他（在那里，20 世纪二十年代的青年人都学习驾车，但不学习驾驶帆船）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至于跨越中美之间的文化鸿沟，问题自然就要大得多。我做为一个为美国读者写作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已经 62 年了，即便如此，我依然无法肯定该如何叙述中国文化。在我看来，确实存在着一种文化差异。不过如果一个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太详细，而所涉及的又是两国人民之间交往甚多之前的较早时期，或许反倒是比较容易叙述的。

例如儒家强调孝顺，以此做为最高尚的品德。人们从《大清律例》中得知，如果儿子不孝顺，以致殴打了父亲，那么这种行为便是违反社会秩序的极大的道德罪孽，父亲即有权将儿子做为邪恶的畜牲处死。当然，信奉儒家教诲的父亲似乎未必都处死好斗的儿子，但法典上的明文规定代表着道德准则。因此，历史学家就可以向他的美国读者指出，在古老的中国，法律与道德在关系上有差异，道德准则一般高于法律。

其次，本书中这些作品提到，咄咄逼人的基督教传教士攻击儒家思想。传教士的自以为是总使我惊愕不已。我的祖父费尔班克是明尼苏达州公理会的教长，他的有些堂兄弟在印度做了传教士。但我的父亲当了律师，而我则从未有过任何宗教信仰，却在颇像“倒转的传教士”的生涯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擅自向自己的同胞说教，讲述关于中国这个神秘而迷人的国家及其文化。我自己在中国只呆过 6 年，显然是冒昧地向美国人谈论有关中国佛教、道教，或在稻田里种植水稻的一切问题，不过教师们就得始终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感同身受地吸取经验。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中国，我和我的夫人所到之处，都有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传教士在中国人民中工作，他们一般都设法提供帮助。儒家思想做为过时之物已被中国革命击败，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基督教会取代了它的地位。基督

教反映了对个人仁慈关怀的西方传统。传教士们发觉，他们并不是在使许多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这不要紧，只要他们的工作是需要的，他们可以帮助解决现代的教育、医药和公共团体的问题。

许多在中国生活中被接受的准则，在传教士及他们在美国小市镇的支持者看来，似乎是奇怪的。这些准则中有的也会使今天的中国读者感到惊异。美国人不习惯于把政府部门的工作看作是最高级的职业。他们赞成小规模政府，极小规模政府，这种政府在教育或宗教、农业、贸易方面不起作用。政府保持军队和法律系统，保障治安。它还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但希望它在智力活动或道德、宗教生活中无所作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在 19 世纪，直至九十年代，美国人民还在向西推移边疆，占领新的土地。

中国读者在回顾这一历史时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直到最近仍然只在美国社会中起很小的作用，政府官员并不比商人、教长或大学教师更重要。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美国做为一个“新”国，不希望国家和官员阶层主宰和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

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在本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公开讨论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时，大多数美国大宗教团体都是亲国民党的，许多美国传教士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强烈的支持者。这个政府 1928 年执政，许下了许多关于现代化和与美国交往的诺言。南京政府的失败有许多原因，特别是具有破坏性的日本侵略。但 1947 年以后的冷战观念已经深入到了美国人的生活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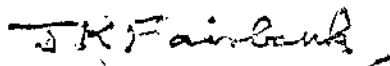
美国人在重庆获得了一种有关中国的不同见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重庆时，曾会见过周恩来、乔冠华、龚澎等

人。当时国民党政府有许多问题，因此当着美国对华政策借助电台广播，最后借助电视付诸辩论时，有许多要争论的地方，美国人确实看法上存在着很大分歧。本书收入的有些文章就反映了那种事实。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全都进入了同一个世界。理由之一是我们整个地球上面临着发展与污染的问题，我们的生存大体上取决于各国人民能进行合作的程度。例如，美国人的第一大杀手便是汽车污染。汽车交通过于拥挤，车祸每天都造成许多死亡事故。美国人的另一个杀手是枪支污染。数千支私人手枪广泛分散在美国民间，警察控制不了，令人反感之极。自然还有毒品污染。这是社会严重紧张的一个征兆。我们与中国都有砍伐森林、耕地侵蚀，以及烟尘等问题。

结果是，在我们跨越文化鸿沟时遇到口号和混乱所构成的奇异混合物，即使我们全都收到几乎相同的世界新闻。但做为处于不同文化中又具有如此不同历史的人民，我们都从自己以往的经历中获取自己的实质性反应，而在其他文化中有不同反应时，我们便感到诧异。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比过去更多地互相研究对方的历史。这是我们共同生存的一个关键。唯其如此，我特别乐于借此机会接触中国读者。



(林 海译)

